

明治日本的漢詩文意識與殖民地統治

——一個社會思想面的考察**

許 時 嘉*

摘 要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國內原本僅止於國學者之間歧視清朝中國風潮，普及至日本一般民眾。這種歧視風潮流行，伴隨著歐化主義與國粹主義兩種相互拉扯的思想脈動，以及教育敕語出現後日本國體意識的確立，「漢學」這門學問在日本國內受到來自於外部洋學者與國學者的挑戰，而被打上種種問號。同時間，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漢學」這門學科的內部，亦出現自我懷疑、自我分化的傾向。受到政治上排斥中國風潮影響，這種對「漢學」的懷疑，逐漸蔓延至漢字、漢文、漢詩的文字使用與創作上。本文將依序討論甲午戰爭前後漢詩文意識的更迭、甲午戰爭時期詩作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漢詩人的創作意識。企圖思索日本自我意識的變化對日本國內漢詩文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動搖日本漢詩人來臺的漢詩文創作態度。

關鍵詞：漢詩文、明治日本、言文一致、日治時期、和臭

2012 年 8 月 3 日收稿，2013 年 3 月 13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8 月 1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日本國立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專任講師。

**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多位先進不吝指教，並感謝《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寶貴的指正，特此致謝。文責作者自負。

一、前 言

2002 年 4 月，一場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學術研討會的評論攻防，曾就日治初期來臺的日本漢詩人是否把臺灣人當成漢學素養優秀的漢民族來看待、當時臺灣人的漢學知識水準到底在中華文化圈中佔有何種地位等問題，出現耐人尋味的爭議。評論者趙天儀對報告者施懿琳「甲午戰後的乙未割臺，是日本第一次統治了一個原本在文化上優位於自己的漢人群體」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日本過去固然是吸收漢文化的傳統，但臺灣的「漢人群體」在當時文化上也未必處於優越的位置。¹

這場沒有結果的爭論，勾勒出一個有趣的議題：日治初期日本漢詩人與臺灣士紳的接觸過程，在「同文」的前提下，可能存在著某種相互較量的緊張性。而這種緊張性往往會被統治者的絕對權威所掩蔽，讓人有可能忽略統治者背後複雜的心理糾結。換言之，若僅以「懷柔」一筆帶過，可能會造成討論日臺漢詩唱和及殖民支配兩者因果關係時僅浮現出統治者等於絕對權威者的片面印象，而看不到內部——不論是社群內部或是詩人內心——所可能存在的緊張關係。

近年學界對於漢詩文在殖民地統治作為同文符碼的可能性與侷限性，已有豐碩研究成果。陳培豐從日本國學者對漢文的定位與變化進行分析，認為日、臺漢文間的「同文不同調」終究是阻斷漢文成為皇民化工具的阻礙。²黃美娥則直指日臺間漢詩的「接觸關係」，從臺島本地的報章雜誌與詩話資料，分析日臺間同文流動與詩文交流係如何重構臺人知識體系，釐清日人文學作品與臺人知識體系間的因果影響關係。³另外，關於「人」的問題，

-
- 1 參照施懿琳，〈從《采詩集》看臺日漢詩人的互動模式與書寫話語〉，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頁 363-398 與頁 399 之趙天儀特約討論。
 - 2 陳培豐，〈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457-498。
 - 3 黃美娥，〈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11): 1-32。黃美娥，〈跨界傳播、同文交混、民族想像：賴山陽在

楊永彬詳盡整理日治初期官民唱和的時間、場所與相關人物的背景介紹，有助於理解日治初期官紳唱和的交流圖譜。⁴森岡緣實證考察、分析鈴木虎雄（1878-1963）與久保天隨（1875-1934）兩人在臺灣的個人活動，清楚釐清日本漢詩人與臺灣漢詩人之間交流實況的空白。⁵橋本恭子以島田謹二的〈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為線索，指出島田謹二與初山衣洲兩人雖不約而同沉浸於國家主義榮光的喜悅，但也同樣懷抱一種知識分子坐困南島之憂鬱與煩悶。⁶齋藤希史以初山衣洲為例，指出當重視音聲的口語白話文與國民國家相結合，初山衣洲這種漢詩人身分的人，勢必逐漸被排除出殖民地舞臺。⁷從宏觀的人流圖譜到微觀的人物圖譜，這些具互補性的研究帶動以下議題：對日本傳統詩人而言，詩文創作與近代文體的衝突如何被弭平？傳統東亞認識與近代國民國家意識的齟齬如何被重整、再生？換言之，漢詩文素養如何從「前現代」的同文共同知識體系，轉變為充滿國族意識的「帝國協力」符碼？這也是本文企圖進一步追索的疑問。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國內原本僅止於國學者之間歧視清朝中國風潮，普及至日本一般民衆。這種歧視風潮流行，伴隨著歐化主義與國粹主義兩種相互拉扯的思想脈動，以及教育敕語出現後日本國體意識的確立，「漢學」這門學問在日本國內受到來自於外部洋學者與國學者的挑戰，而被打上種種問號。同時間，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漢學」這門學科的內部，亦出現自我懷疑、自我分化的傾向。中國學（即日文中的「支那學」）脫離漢學自成一門學問獨立，即可視為這種內部分化的結果之一。受到政治上排斥中國風潮影響，這種對「漢學」的懷疑，逐漸蔓延至漢字、漢文、漢詩的文字使用與創

臺灣的接受史（1895-1945），陳芳明編，《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16-41。黃美娥，〈在「同」與「不同」之間：玉山吟社的詩歌空間意義與社群文化生產〉，「帝國在臺灣工作坊」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6.15）。

- 4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2000），頁105-181。
- 5 森岡緣，《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東京：勉誠出版社，2008）。
- 6 橋本恭子，《『華麗島文学志』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臺灣体験》（東京：三元社，2012）。
- 7 齋藤希史，〈〈同文〉のポリティクス〉，《文学》10.6(2009.11): 38-48。

作上。明治時期以來對漢字的排除，或是重新在創作面或藝術面上思考漢文漢詩創作的價值，都可視為這種社會脈動所衍生的現象。

弔詭的是，日本國內大力排斥漢詩文的同時，社會上卻出現另一種對漢詩文的執著。甲午戰爭期間，日本漢學家兼詩人國分青厓受山縣有朋將軍之召前往清國，日本詩文雜誌《精美》發表以下記事：「赴清國願以其健筆震倒清國豬尾奴，待他們在我皇軍旗下搖尾乞憐，其文壇對我大豎白旗之日亦必不遠矣。」⁸這篇簡短的評語，似乎意味甲午戰爭點燃日人某種主導東亞版圖的鬥志——不論是在兩國戰場上的交鋒，抑或是文壇領導地位上的競爭。這種心情抒發並非單一偶然的個案，直到日清戰爭結束後依然可見。⁹

另外，1890 年代日本漢詩壇的再興，與同時間甲午戰爭的時局發展，呈現極大的反差。《日清戰爭實記》等戰爭報導雜誌大量刊載紀念戰爭勝利的漢詩，坊間也出版許多征清詩集，包括岡鹿門《日本詩軍》（1895）、野口寧齋的征清詩集《大燾餘光》（1895）與征俄詩集《征露宣戰歌》（1904）、高橋白山《征清詩史》（1897）等。漢詩一度蔚為風潮，街上人人爭讀《詩韻含英》的景象處處可見。曾有研究者指出，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期間漢詩興盛的原因在於對戰國與交戰地是中國，地名或人名以漢詩方式詠嘆較為容易，且漢詩本身是適合詠嘆戰爭各式場景的詩體詞類。¹⁰ 這種論點雖具客觀性，但無法解釋一個民族本位的疑問：1894 年開戰的甲午戰爭從開始到結束，一路上都有舉國一致、充滿民族愛國意識的人民輿論支持。但與敵國交戰的同時，這些愛國的人民卻大作「敵性文章」而不自知——特別是 1895 年《太陽》雜誌上已經出現排漢字漢文爭議，同一時間漢詩文卻風靡一世。此現象值得玩味，似乎透露出當時社會氛圍的重層性與複雜性。

有人大力排斥漢詩文的同時，有人卻想要征服它、將之納入自我體系。這種彼此完全迥異、卻又相互交疊的社會思想的呈現，正是本文想討論的主

8 不著撰人，〈国分青厓の從軍〉，《精美》（東京：益友社，1894），39 號，頁 22-23。

9 1898 年田邊蓮舟盛讚中島龍山某篇漢文時寫道：「此吾友龍山所製。文氣奔放。直往無前。……而其構淵源昌黎。筆墨彷彿柳州。我東邦文章有如是者。足使辮髮者吐舌。」龍山居士，〈送傳雲龍序〉，《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8），8 號，頁 7。

10 合山林太郎，〈野口寧齋の後半生——明治時期漢詩人の詩業と交友圈〉，《斯文》115（2007.3）：1-16。

題。為求行文方便，本文將之統稱為「漢詩文意識」。這種漢詩文意識如何與日本國族認同與帝國主義思想相互匯流、連動，又或是出現對立、齟齬、質變，並進而造成日本漢詩人們前進殖民地時，在創作上與國族意識上的優勢或困境。筆者認為，這股漢詩文意識內部意見的交會與轉變，是討論漢詩文與殖民地統治之間的互動時，首先要釐清的問題點。

另外必須說明，「漢詩文意識」一詞，因牽涉到漢詩文結構本身的重層性而具備多義性。例如明治時期知識分子對漢詩文的觀感變化，實存在多種考量機制，像是漢字漢語的非／便利性、漢文脈與和文脈的轉換性、漢詩文的非／實用性、漢詩文創作上的高雅性與鑑賞性等等。這些不同面向的考量因素往往相互牽動、卻又彼此牽制。若按順序粗略重新整理，大致可分為漢字漢語（針對文字上的論爭）、漢文（針對文體上的論爭）、漢詩（針對文學性的論爭）三個層次，再分別依據實用性、簡潔性、傳播性、藝術性、民族意識等判斷價值而考量。換言之，如本論文接下來所進行的分析顯示，根據字體短小的簡潔性來認可漢字漢語的人，未必認同文體全然不同的漢文、漢詩。同理，根據字體的高雅性來認同漢字漢語者，或是就「讀懂漢文有利理解古籍」的漢文實用性來認同漢文者，往往也認為漢詩是文字遊戲而不屑一顧。又或是因為創作目的不同，同樣對漢字漢文漢詩認同者，彼此間對藝術面的追求也會出現全然不同的思考。特別是當這些意識與甲午戰爭下中日對戰的時局相互擦撞時，即會產生政治性的化學效應與思想上的反轉，造成交互雜揉卻又層層相斥的現象。筆者認為，這種對漢字、漢語、漢文、漢詩的種種思考，其實是重視實體性或重視機能性——亦即主觀認定的實體化作用與機能認識所產生的客體化作用——兩種力道拉扯下所產生的結果。¹¹這兩種力道將影響日本自我認識鬆動與自我定位轉移的方向和速度。

以下，本文將依序討論甲午戰爭前後漢詩文意識的更迭、甲午戰爭時期詩作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漢詩人的創作意識。透過同文的傳統與前述面對漢詩文時逐趨明顯之自我意識的交互對照，本文企圖思索日本自我意識的變

11 本文引用概念來自於卡西爾 (Ernst Cassirer) 提出的實體概念 (Substanzbegriff) 與機能概念 (Funktionsbegriff)。詳見カッシーラー (Ernst Cassirer) 著，山本義隆譯，《実体概念と関数概念：認識批判の基本的諸問題の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1979)。

化對日本國內漢詩文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動搖日本漢詩人來臺的漢詩文創作態度。

二、甲午戰爭時期漢詩文意識的版圖變化

(一) 漢字漢語觀的機能化認識

甲午戰爭結束近半世紀後，日本的中國語學者倉石武四郎於 1943 年 5 月發表〈漢文教育的問題〉，呼籲正視漢文教育衰退的問題。¹² 倉石將明治維新以來，漢文教育隨著日本國威發揚而逐步衰退的歷史，與中國學脫離漢學的發展過程，視為兩個同時並行進展的歷程，他感嘆：「過去以來，隨著中國語教育的發達，漢文教育則愈見萎縮。」¹³ 另一方面，倉石將甲午戰爭定義為「長久以來培養的中國崇拜思想，……被徹底打碎的值得紀念的時機」；並認為要「以大東亞的盟主之姿取得對中國的指導地位」，「對國家而言，絕對需要不斷地培養出……足以震撼中國人業績的偉大中國研究者」。言談裡充滿對日本中國學的肯定，認為中國學的推展勢必會對國威發揚有所貢獻。¹⁴ 在這篇文章一個簡短的結論中，他主張日本目前的漢文教育不該以方便讀支那文章的工具論角度來定位，而是該排除所有的中國要素，放棄與日本在地文史毫無關係的唐宋八大家文及十八史略，或將這些具有「中國成分」者轉移至外國語學科，轉而研讀日本外史等日本人的在地漢文作品，藉此喚起日本精神。¹⁵ 倉石一直以來主張直接用北京官話學中文，反對透過漢文訓讀的方式來學中國話。故這篇討論漢文教育的主張背後，實延續他長久以來作為中國語學者的思考，認為中文是中文，日文是日文，兩者不該等同視之。¹⁶

12 倉石武四郎，〈漢文教育の問題〉，《倉石武四郎著作集》第 1 卷（東京：くろしお出版社，1981），頁 284-306。

13 同上註，頁 291。

14 同上註，頁 288-289。

15 同上註，頁 294-295。

16 作為同時期中國文學研究者，吉川幸次郎的漢詩文觀呈現不同於倉石的思考面向。兩人都同樣意識到漢文教育逐漸沒落、人們不再認為漢文教育有何重要，但相對於倉石認為應該讓漢文教育直接日本化、國語教育化，將中國傳統古籍完全排除在外，吉川卻主張

這篇富含暗示的文章，顯示漢學相關學問進入近代以後，面臨定位上的困境與矛盾。我們可以從倉石的發言，嗅出兩種不同層次的歷史意義。第一層意義來自於漢文教育的認識斷層。中國語教育的推展帶來漢文教育的沒落，這番話反映這位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國語言學家的個人知識脈絡：漢文教育與中國語教育，係屬兩種必然對立、完全不同屬性的概念。換言之，這兩種語言教育背後所代表的學問體系——漢學與中國學——在以前江戶時代原本系出同門的事實，竟在明治時代的某個時點被遺忘，導致倉石自然將之視為兩種截然不同的個體。這種現象意味著，隨著近代國民國家意識轉趨成熟，日本漢學相關學問反而成為被排除在外的對象，落入日本國學與中國學之間的縫隙，既不被前者認可、又不為後者接納，落得兩邊都不討好的處境。

第二層意義是來自於倉石對甲午戰爭後日中關係反轉的認識，反映明治時期中國學自江戶漢學獨立，蘊含高度政治意涵。過去學者指出，明治時期中國學的成立，係「中國」此一概念經過洋學衝擊，從一個絕對崇高的主體落為一個可觀察的客體，並受到企圖確立「日本」主體地位的國族意識影響，逐漸發展而成。¹⁷ 透過這種「中國」概念的客體化，日本近代的中國學(Sinology)的確展現許多高水準的學問成果。那珂通世、內藤湖南、桑原鷺藏等優秀的東洋史學研究是最好例證。但另一方面，這也呈現出一種重構東亞版圖的欲望。¹⁸ 換言之，以甲午戰爭為分歧點，東亞各國的序列關係開始

須回歸到東洋共通的精神世界基礎，加強以漢文為基底的傳統東洋世界的認識。到了戰後，吉川更加強調漢文與近代日本文學之間的連結性，推崇漢詩文世界的精神。詳見氏著，〈支那人の日本觀と日本人の支那觀〉，《支那人の古典とその生活》（東京：岩波書店，1944）；〈中国の古典と日本人〉，《中國詩史》（東京：筑摩書房，1967）；《漢文の話》（東京：筑摩書房，1962）。

17 近年也出現如齋藤希史所主張的論點：日本中國學的形成原因不單單受到西洋 Sinology 傳入的影響，還包括漢學內部經義（哲學）與詩文（文學）之分離。這種漢學本身的分化與重編，造成中國學得以成立。齋藤希史，〈「支那学」の位置〉，《日本思想史学》39(2007.9): 3-10。

18 已有研究者從戰前亞洲觀的變遷來討論日本膨脹主義或「大東亞共榮圈」概念出現的共犯結構問題。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針對 1910 年代日本漢學者的思想演變，透過概念移動的角度，考察「東洋」、「東亞」、「西洋」、「支那」等概念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上演變的過程，

變化。過去中國絕對領先的地位產生崩裂，重新定義日本在東亞儒學世界地位的傾向開始出現。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這種漢學本身自我分化及將「中國」、「支那」不斷客體化的過程，一方面在近代西洋文明標榜學問實用性的研究層面上，另一方面則在國族認同統合的政治層面上，兩者同時並行發展著。這種雙面性格本身的矛盾，很容易引爆明治時期知識分子對日本漢學相關學問發展時的歧見。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日本國內討論「國語」問題時，漢字漢文總是第一個被拿出來討論的對象。1866年前島密提出漢字廢止論以來，假名論、羅馬字論、漢字節減論與各個反對意見，不斷在國語相關論述中登場，甲午戰爭時期甚至曾經出現一波討論廢除漢字與否的高峰。過去論者對這些漢字廢止論爭的歷史認識，主要集中於言文一致的問題上。例如山本正秀主張言文一致議論開始之初，前島密、西周、福地櫻痴、渡邊修次郎等人，皆是有感於口語與書寫之間的距離，阻礙群眾啓蒙與文明化的推進，故以改革文字與文體為目標，將言文一致視為傳達知識的手段。但之後，言文一致活動的重心則從啓蒙立場逐漸轉變為言文一致本身的必然性。如田口卯吉的意象論或神田孝平的言語改革論，可發現言文一致的概念在社會已經定型，他們多主張透過思想改革來達成言文一致的成功。在山本正秀的縝密分析下，讀者可以發現漢字廢止論爭的歷史形同一部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史。

循著山本列舉的多種例子，可發現各個階段的議論內容，雖分成視覺表現上是否能達到一目瞭然、簡潔易懂的記號使用（文字面），或是文章與音聲、口語結合的可能性（文體面），抑或國體論及文化美學（意識型態面）等等不同層次的考量，但各個層次卻又相互交錯，反映出重層式的意見。透過各種意見的交鋒，隱約可以歸納出一種將漢語漢字機能化的傾向。

例如，提倡平易假名文的前島密、清水卯三郎，以及實現文章言文一致的前提下主張採用洋文表記的西周，他們都同樣有感於作為書寫文字時漢字本身型態上的繁雜，故提出用平假或英文字母來代替漢字。漢字從過去學問上神聖優越的地位，轉化為機能主義式的、單純作為意思傳達使用的一種道

分析近代日本漢學家與戰前日本向外膨脹的共謀性。

具，也因此浮現出與其他的語言記號替換的可能性。這些漢字廢棄論，與過去日本國學者荷田春滿「ふみわけよ 大和にはあらぬ唐鳥の跡を見るのみ人の道かは（開出自己的路吧，只讀大和民族沒有的龜文鳥跡，豈是學問之道）」，基於日本民族意識、反對中國崇拜的執著心理，呈現出完全不同層次的思考。

這種漢字漢語觀的解體，最後演變到田口卯吉的〈意匠論〉，自然不太讓人意外。田口在 1885 年 8 月《東京經濟雜誌》連載的〈意匠論〉中寫道：「文學之味不在文體而在意象，若其高貴的意象可用普通的語言來表達，才是自由。」同一時間，田口自 1885 年 6 月開始在日本羅馬字會機關誌 *RŌMAJIZASSHI*，以羅馬字重新連載成名作〈日本開化の性質〉，早一步實驗運用羅馬字來達到言文一致的可能性。田口將文學的趣味，從「使用漢文即為雅」之美文本位論的束縛下解放，主張新思想可以直接表現與否才是重要的。¹⁹ 田口的本意雖是要提倡接近口語的文體，但若沒有重視文之內容大於文之「形體」的想法，要想輕易與漢字的世界做出切割、並馬上轉而投身羅馬字世界，肯定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同樣從漢語機能性的角度出發的漢字漢語不可廢論，呈現出一種十分有意思的對照。《經國美談》的作者矢野龍溪在 1886 年 3 月發表的《日本文體文字新論》中提到，比起使用由複數音節組成的日語，使用「短音急聲」的漢語才符合追求便利的「言語之理」，因此，對於重視意思傳達的一般報紙文章或教育用書、政府公告等一般書籍，他贊成減少漢字使用，但反對全面性的廢止。²⁰ 另外他也表示，在音聲表達的口語世界裡，多傾向使用耳朵易懂的冗長日常用語，但在眼睛閱讀的書本世界所追求的，卻是形體簡短、馬上可以解讀其中意思的表現方式。²¹ 亦即，矢野主張漢語簡短的發音與輕巧的字形明顯要比假名來得便利。他以明治口語表現的冗長、敬語表現的繁雜、明治時期標準語的不成熟、文章表現與口語表現之間的差異等為理由，重申他認為追求言文一致的時機尚未成熟的立場，並機能主義式地強調漢語本身的便利性，矢野這種作法與過去重視漢字漢語之風雅或其意識型態

19 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發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65），頁 310。

20 同上註，頁 346。

21 同上註，頁 346-347。

的主張，呈現完全不同的思考。²² 從精神論式意識型態演變到機能主義式工具論，這種視漢字漢語為一種工具，並對其中的機能性開始出現的關注，其實預告了以下現象的出現：與過去重視漢文本身精神性——例如國族認同意識、或是日本文化中漢文漢語本身的實體性——相互分離，並客體化彼此的力道，已逐漸萌芽。這種實體概念、機能概念所歸納出的客體化力道，有助於我們釐清甲午戰爭日本國內漢學漢文教育正反輿論的交鋒，以及後續的演變走勢。

(二) 漢文教育的另類風化與「我文脈」的確立

日本在甲午戰爭取得優勢後，國內掀起排斥漢學、廢漢字漢文的風潮。當時教育界內流傳著正科學校教育廢除漢文訓讀的主張。這些立論的問題點在於漢文的他者性，亦即：漢文需要靠訓讀訓練才能讀得懂，與其說是日語，倒不如說是外語來得恰當，若不裁撤只會造成學生負擔。

爲了反駁這些論點，部分教育者與漢學者把關切重心擺在漢學對日本人之不可或缺性，認爲將仇視中國的情緒一味地轉嫁到漢學身上萬萬不可。例如教育家湯本武比古在《精美》中提到：「漢學之於我國正如希臘拉丁之於西洋各國一般，乃君子之學問，絕不可偏廢。」²³ 強調漢學素養之於日本人是同等重要。一如西方的精神文明是由希臘羅馬時代的學問或哲理所構築，日本的漢學理所當然被視爲養成君子精神般倫理思想的學問。他還提到，漢學中有許多足以奉爲人生圭臬的聖賢之道，藉由漢文的素養不但可以理解古典漢籍中先賢的教誨，也可以在學習普通知識之餘，培養道德觀與倫理觀。另

22 山本正秀並指出，同一時期《東洋日日新聞》的社論主張漢語無用論，並高舉漢語漢文體廢止論，是因爲強烈意識到漢語漢文本身所具有的中國意識型態。例如將「中國語」當作「外來語」，而主張將之驅逐出日本文章的用字與文法之外的言論（1885年7月25日社說〈文章ノ進化〉），又或是因爲意識到中國文明的落後性，而認爲在當前歐美文明已成常態的社會之中，「僅僅在文章上學中國那套，有何前景可言？」（1887年1月27日社說〈文章の改良〉）的想法都屬此類。另一方面，西村茂樹則從文章的高雅性來強調漢語漢文之價值。他雖然將漢文視爲無法自由使用的他國文章而贊成廢止，但他卻又對於言文一致所造成的文章鄙俗化始終抱持警戒的態度，因而推薦使用由「品格優等」的漢文體所組成的「片仮名交り文」。山本正秀，《近代文体發生の史的研究》，頁335-338、689-696。

23 湯本武比古，〈漢学の教育的価値〉，《精美》（東京：益友社，1895），41號，頁45。

外，針對「漢文脈」三不五時就被提及「他者性」的問題，湯本提出了以下的反駁：「凡是學習思想相異之語言，便具有修鍊心志之價值。我國人民閱讀文法完全迥異之漢文洋文，對於思想之修鍊乃極具價值。」²⁴ 湯本具體指出，入門的小學教育廢除漢文課無妨，但高等普通教育不僅僅要練習漢字，還必須養成自由運用漢文寫作的的能力。²⁵ 他雖然把學生接觸漢文的時期從小學延後到中學，卻把中學校裡漢文科當成重要學問科目加倍重視。站在教育現場第一線看來，這種主張未免不食人間煙火：因為若無基本漢文基礎，到了高等教育馬上要學生寫出流暢的漢文等於天方夜譚。

值得注意的是，湯本雖將漢學定義為「君子之學問」，顯現其重視漢文精神性的性格，但他以「思想相異之語言」來定義漢文的同時，卻將漢文與歐文擺在同等地位，這種作法流露出將漢文邊緣化於日文之外的一面。江戶時期松平定信主導「寬政改革」（1787-1793），禁異學、獨尊朱子學，奠定漢文作為唯一學問之道。自此以來，漢文除了意義／音聲組合而成的言語機能，還被賦予了「身為知識的普遍性」及「作為學問的固有性」兩種性格。然而，一旦身為「語言」的機能性被過度強調，過去在知識上、學問上擁有的絕對特權色彩即逐漸褪卻，這會導致長期以來漢文內在思想與外在文體的一體性開始崩壞。²⁶ 換言之，漢文被當成「語言」定義的瞬間，漢文已非思想本身，而是被機能主義式地當成一種傳達思想的工具來考慮、衡量。

除了湯本之外，這種重視漢文機能性的想法也可在東洋史家市村瓊次郎身上發現。市村在 1894 年便指出「日本固有語言的性質雖然優美但卻有弱點」，「截漢文之所長以補國文之短乃當今文學最需著力之處」。²⁷ 面對中學

24 同上註，頁 45。

25 同上註，頁 44。

26 將漢文脫意識型態化的趨勢，隨著時代變化，其方向也出現微妙的轉變，但早在江戶時期已然可見。這方面可參考子安宣邦對荻生徂徠漢文訓讀意識的討論。子安指出，徂徠對於漢文訓讀的傳統多有意見，是因為將漢文轉化為和文的過程中，首度意識到這其實是一種讀和文的表現，而非真的在讀漢文。子安認為，這種認識已開始將中文視為異質之語言。請參考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第 3 章〈他者受容と内部の形成——漢文訓読のイデオロギー〉，頁 71-100。

27 市村瓊次郎，〈中学教育における漢文の価値〉，《精美》（東京：益友社，1894），20 號，頁 4。

教育中漢文科目的重要性，他則表示：「養成國民特有智識德性之工具，引導東洋人本身之觀念，足以養我德性、足以助我文學者，捨漢文外，焉有其他。」²⁸ 市村將漢文定義成「養成國民特有智識德性的工具」，認為養成東洋人本身的觀念與涵養德性上，漢文具有不可或缺之處，故有繼續學習漢文的必要性。市村的理由在於，當中國與日本的古典著作皆以漢文呈現，學習漢文自然成爲了解古典知識世界的重要手段。

然而，此處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將漢文比喻爲「養成國民特有智識德性之工具」。這樣的比喻雖然將漢文歸類爲有益於知識道德養成，但同時，使用「工具」這樣的說法，意味著漢文的另一個性格：它僅僅只是「媒介」、「道具」的特性。於是，當漢文以其身爲表記符號的機能性被強調與重視之餘，卻也曝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含意：若要求得君子之學問，未必非得從漢文下手才行。換言之，漢文不再是過去高高在上、唯我獨尊的「學問」，而變成一種能夠與其他語言相互置換的「語言」。²⁹

問題在於，此處「其他語言」意指爲何？當時文部大臣井上毅的發言，或許可以覓得蛛絲馬跡。井上毅提及漢文教育時曾說道，中國的經學對日本的倫理發展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且日本語少不了中國文字當教育素材，但從古至今，漢文教育都被誤用爲「吟詩作對的科目」，始終無法從「模擬漢文的春秋大夢」中覺醒。³⁰「漢文與國文語法語格完全相異，雖然漢學可以運用在教育上，但卻沒有必要再去模擬漢文」，「就算不會寫漢文，也無礙於讀漢文書籍或使用漢字」。³¹ 此外，他與落合直文、小中村義象等國文學者討論國文時，認為國文的詞語可以出現漢語、漢字或西洋單字，但最終的結論是「文脈必定要是日本文脈」。³²

28 同上註，頁 5。

29 感謝匿名審查人提醒，本文無意將漢文置放於「精神性／機能性」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討論。本文想強調的是：漢文在東亞歷史脈絡發展中，始終兼具實用性與超越性兩種不同性格，只是隨著時代變化與意識形態影響，而存在某些性格較爲突出或某些性格較爲隱晦的現象，如同光影的兩面，會隨著外在影響時暗時明。

30 井上毅，〈漢文教育論〉，《精美》27 號，頁 3。完整版爲〈学校の教科における漢文の問に答へし文〉，收錄於小中村義象編，《梧陰存稿》（東京：六合館，1895）。

31 同上註，頁 3-4。

32 〈国文界の消息〉，《帝国文学》（東京：帝國文學會，1895），卷 1 號 4，頁 72。

日本對中國的仇視情緒，以及部分文化孕育自漢學基礎的歷史事實，兩方交錯下，雖然讓日本固有精神的漢學價值一再地被提起、被確認，進而被納入教育制度的一環；但另一方面，若不學得「漢文訓讀法（読み下し）」便無法讀懂的特徵，讓漢文成爲一種他者般的存在。這是 1890 年代日本意識急速高漲期間，漢文對形構國語意識造成的第一道障礙。是故，井上認爲，無論使用漢字、漢語成語、或是西洋單字，都不妨礙國文的運用，但連結這些漢字、西洋單字、或日語時，卻有一個不可不遵守的大前提，亦即：既不能被漢文脈支配、也不能被西洋文脈左右，必須使用從古代流傳至今、多少有些改變但卻保持一貫性的日文文脈才行。《帝國文學》的評論者們進一步地做出了以下的解釋：「用語不分古今中外，凡使用我文脈者一律稱爲國文。」³³ 換言之，對當時的日本知識人而言，儘管文章中出現了任何漢語、西洋單字等屬於「外」的他者符號，但只要其文脈爲日語的「我文脈」，便足以稱爲國文。

齋藤希史討論明治時期國民文體成立時曾指出，國民文體之所以形成，作爲「今體文」、亦即明治時期所謂「現代文」的訓讀文從漢文獨立出來，才是根本主因，言文一致的出現只是衍伸性的結果。他指出，山路愛山與德富蘇峰會不約而同將《日本外史》的漢詩文評價爲「中國式的」、「不自由的漢文」，其實是表現出一種對歷史的徹底遺忘：忘記在賴山陽生長的時代下，用漢文寫作才是一介文人最理所當然的著述手段。這也恰恰反映出過去漢文的普遍性，在過了明治時期以後，已經被訓讀文替代。³⁴ 齋藤明確地強調，明

33 不著撰人，〈国文脈〉，《帝國文學》（東京：帝國文學會，1895），卷 1 號 5，頁 68。傍點爲原文所標。

34 請參閱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7），第 2 章〈国民の文体はいかに成立したのか〉，頁 77-116。然而，相對於有些人將漢文視爲不自由之物，亦有人毋需透過訓讀返送點即可讀懂漢文。如 1893 年三宅雪嶺寫下日本有史以來第一部王陽明評傳《王陽明》，第三部「詞章」在雪嶺的解說後收錄王陽明的詩文，其中未含任何訓讀返送點，顯示當時存在著不需透過訓讀文即可理解漢文的讀者層。小島毅，《近代日本の陽明学》（東京：講談社，2006），頁 73-74。另外，漢文訓讀體發展過程的內部還存在近世「道春點」、「闇齋點」、「後藤點」、「一齋點」等各種訓讀法的馴化、反思與重整，請參考齋藤文俊，《漢文訓讀と近代日本語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2011）。

治時期近代國家成型的過程裡，「訓讀文體的形式，一方面保持了漢字漢語本身的高度機能性，另一方面也成爲脫離出漢文精神世界的一葉方舟」。³⁵ 從這個角度看來，當「我文脈」受到注目的同時，漢文身爲漢學學問一環——從古代宮廷到江戶時代流傳至民間的基本教養——之普遍性已不復見，漢文被還原成只剩漢字漢語這種語言層次的機能性質。表面上看來，漢文似乎是以漢學基礎之姿，風光地在國民教育科目中佔有一席之地，但其中也造就了一種矛盾的現象：人人必須有意識地將漢文脈轉換爲和文脈，來完成自己的國民化。

子安宣邦的說法或許更能凸顯這種特色。子安宣邦過去即指出，假名漢字混合的日文文體之形成，與漢文文本的訓讀化，兩者關係密不可分。和文形同孕育自漢文訓讀體。³⁶ 另外，子安定義漢字在日本國語成型過程裡扮演的角色時曾提到，漢字在日語中帶有「中國製」的意味，又或者更明確定義，這種意味其實像個標籤一樣，是不斷被貼上、被賦予的。這種不斷被賦予中國性而後再剔除或融合的現象，其實正是日語自我發現的過程。他認爲，漢字對日語而言是個「不可避的他者」，日語的原生言語得以不斷地與外界進行接觸、衝擊、融合與排除，藉此重新定位、摸索出新自我，開創出一連串語言變化，這種變化的契機正是來自於漢字本身的他者性。換言之，日本語的成立雖然有一大部分來自於對中國語此一異質語言的受容，但它演變成國家語的過程，其實恰恰是種持續將漢字作爲他者來看待、不斷相映對照、尋找出自己的過程。³⁷ 中村春作則進一步解釋，用來對抗「漢意」的「やまところ」（大和心）、「やまことば」（大和語），乃透過「訓讀」這個過濾裝置，而得以逐漸獲得優越性。³⁸

從捍衛漢文的各種聲音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強調漢文對日人思想修鍊、或是漢文作爲智識養成的工具，這些主張都是出自漢文作爲一種語言的工具性價值而來。漢語漢文的價值不是被實體性地掌握，而是擺在重視工具性的

35 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頁 95。

36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頁 74。

37 同上註，頁 232。

38 中村春作，《「訓読」の思想史》，中村春作等編，《「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東京：勉誠出版社，2008），頁 20。

機能主義的基準上被評斷，進而造成內部的質變。是故，漢語漢文形式上雖獲得保存，但內部卻被新興的國家主義與國民意識型態趁虛而入，轉化為漢語漢文得以存續下去的新價值。

三、規範的超脫：一個重構正統的可能與侷限

(一) 借力使力的創作模式

甲午戰爭前後，出現大量紀念戰爭的漢詩。戰爭開戰後 1894 年 8 月，東京博文館出版報導戰事的《日清戰爭實記》雜誌，以每個月出刊三次的頻率，鉅細靡遺報導戰事經過。直到 1896 年 1 月為止，前後共出刊 50 卷。該雜誌設有文藝欄，刊載謳歌戰爭的漢詩與和歌。活動者多為當時知名的漢詩人，³⁹ 另外也有政府官員舞文弄墨之作，⁴⁰ 其中不乏後來活躍於臺灣詩壇者。到了 1895 年 12 月至 1896 年 1 月的最後幾期，吟詠的舞臺搬到臺灣，參與吟詠的詩人包括臺人士紳。⁴¹ 這些漢詩作品根據戰事發展，盛讚日本皇軍氣勢如虹、力拔山河。從《日清戰爭實記》漢詩和歌並載的方式看來，漢詩作為日本文學的固有文類，在此單純是吟詠戰勝之情的文學形式之一，似乎不具特別的政治意識。

然而，若深入分析這些戰爭詩的格律與內容，可發現與漢詩「本家」中國對戰的過程中，他們善用漢詩的固有構造，並藉由轉喻的文學技巧，隱隱然於筆墨間顯現日本的特殊性與優越性，藉此完成有別於戰場上刀光劍影之外的另一種對戰。

抒發驅逐滿清「韃虜」之志的作品，可謂典型之例。田中光顯的「鐵鞭

39 如依田學海 (1834-1909)、嵩古香 (1837-1919)、岩溪裳川 (1852-1943)、岸上質軒 (1860-1907)、本田種竹 (1862-1907)、高野竹隱 (1862-1921)、森槐南 (1863-1911)、佐藤六石 (1864-1927)、福井學圃 (1868-1918)、初山衣洲 (1858-1919) 等。

40 如山縣有朋 (1838-1922)、乃木希典 (1849-1912)、曾任貴族院議員的田中光顯 (1843-1939)、曾任內務大臣的副島種臣 (1828-1905)、時任宮內大臣的土方久元 (1833-1918)、後來臺任總督府通信課的土居香國 (1850-1921) 等。

41 如王明珠、王拱辰、蔡光瑞、李春生、林炳侯、陳淑程、葉揮五、張希袞、劉廷玉、黃茂清等。

直指古三韓，今日何須髀肉歎，此去期君掃胡虜，平安道上報平安」。⁴² 詩作背景為 1894 年 7 月至 9 月陸戰的平壤之戰，期許日軍長征朝鮮北方平安道，驅逐「胡虜」清兵，為國立功。另外，1894 年 9 月黃海海戰大捷後，副島種臣（蒼海）寫下「戰勝餘威震朔河，秋高群雁亂行過，我兵所向摧枯葉，韃韃胡王奈汝何。」⁴³

前者田中光顯明確指出「古三韓」、「平安道」等戰地地點，凸顯詩歌與現實時空之間的連結性，後者副島種臣則直接運用中國邊塞詩的時空架構，假借河套平原為交戰地，將清兵轉喻為侵略中原的北方蠻族。共通的是，這些詩作明顯挪用中國古詩的邊塞風光、塞外長征的常用場景，將過去中國歷史上「中原正統力抗北方蠻族」的對戰模式，轉化為日軍（正統）與清兵（胡夷）的對立。這種透過中國邊塞軍旅詩書寫形式的再生產，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展現日本江戶時期儒者間流傳的「華夷變態」思想，⁴⁴ 認為明朝被清所滅、全民強迫辮髮胡服後，兩百年來中國已成蠻夷之地；⁴⁵ 另一方面在文學層面上，呈現出重構正統、再創典範的可能性。

類似的例子也可見於用典。愚庵禪師〈送國分青崖從軍〉：「孤劍三千里，書生報國新，將軍新賜坐，草檄思陳琳。」⁴⁶ 陳琳為魏晉南北朝建安七子之一，文采洋溢，原為何進主簿。後任袁紹幕僚，寫下知名的討曹操檄文《為袁紹檄豫州文》，歷數曹操罪狀，文筆高超，讀者莫不深受煽動。陳琳後來被曹操俘虜，據稱曹操本人讀完檄文後亦佩服其通詞達意、文采逼人，因

42 田中青山，〈送別〉，島田薰編，《日清戰爭實記》（東京：博文館，1894），第 4 編，頁 75。

43 副島蒼海，〈偶吟〉，島田薰編，《日清戰爭實記》第 6 編，頁 74。

44 參見林鶯峰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另，相關研究參考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22.3(2011.9): 71-112。文中指出江戶時期日本知識分子，分別依地理方位、名分論／水土論、漢字圈固有「文」（包含文章、禮儀、政治技術、制度等廣義的「文」）的傳統等不同的判斷標準，對中日華夷關係進行分類與認識。

45 甲午戰爭時期嵩古香的詩作也直指此點：「愛親（作者按：新之誤）覺羅胡為者，起乎韃韃勢一瀉。四百餘州拓手收，竟令朱明屋宗社。夏夷倒置兩百春，子孫相承統絲綸。」詩中控訴清朝統治中國以來造成的華夷顛倒，藉此強化征清的必要。嵩古香，〈征清歌〉，《日清戰爭實記》第 7 編，頁 76。

46 愚庵禪師，〈送國分青崖從軍〉，《日清戰爭實記》第 11 編，頁 68。

愛才而留用陳琳。這首詩暗喻國分青崖受到山縣有朋將軍賞識，如同陳琳受袁紹重用。冀望青崖如陳琳善用文筆批判曹操般，批判中國罪狀，連中國人讀完都能佩服其文筆。

(二) 戲仿與顛覆的極限

著名日本漢學家岡千仞（1832-1913）是另一種「顛覆」的代表。1895年出版征清詩集《日本詩軍》，收錄五言與七言之古詩、絕句、律詩、排律共一百首。根據自序，此詩集「專敘日清事件之巔末，起於朝鮮騷動，中於日清戰爭，至於媾和談判成而止。期間事實，一切不漏。」⁴⁷ 細觀這些作品，當中多為頌揚日本軍威、貶抑清國與朝鮮之作。這種嘲諷中國的心態，或多或少來自於岡千仞 1884 年 5 月至隔年遊歷中國的生活經驗。作為少數幾位有機會在 1880 年代就親眼目睹中國現況的日本人，岡千仞後來寫成《觀光紀遊》（1892），毫不掩藏對中國的失望與批判。⁴⁸

《日本詩軍》當中不乏改編自中國名詩的作品。⁴⁹ 岡千仞自承這些詩作仍屬於中國傳統詩五言七言絕句律詩的文體，卻以日本江戶的「狂詩」形式，摻以俗語而成。詩中善用日本本土文法與用詞，或用「天狗」、「臆病」、「河童」、「坊主頭」、「申込」等日本特有漢語，又或用日文訓讀法的字詞排列順序，內容上已非純然漢詩。故雖然同為漢語，但大部分的內容僅有日本人才看得懂。他於漢文序中自我解釋道：

寫以狂詩，出以俗語，雖似出放題出鱈目，中自寓一種日本魂者焉。車伕可讀，馬丁可解，三歲之小兒、七旬之老婆，亦可以吟而玩，而愛國敵愾之心，勃勃然自笑門生矣，命曰日本詩軍者，此之謂也。⁵⁰

「出放題」與「出鱈目」皆為日文，透過訓讀後日文語順兩者應當顛倒，變成「デタラメ出放題」，意指「荒唐盡出」。岡千仞深知這些詩作多用日本俗語寫成，完全不符傳統漢詩寫作模式，看似「荒唐盡出」，但這些被傳統漢

47 烏玉山人（岡鹿門）著，《日本詩軍》（東京：新進堂，1895），〈序〉，頁 12。

48 岡千仞著，張明杰整理，《觀光紀遊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154、320。

49 如模仿李白〈將進酒〉與高啓〈宛轉行〉等。

50 烏玉山人（岡鹿門）著，《日本詩軍》，〈序〉，頁 12-13。

詩公認「荒唐」的用字遣詞，背後卻代表日本在地風土經年累月轉化而來的歷史與文化深度，故「中自寓一種日本魂焉」，舉國上下人人可頌，莞爾之餘，愛國之心油然而生。

一首嘲弄朝鮮聯合清朝抵抗日本的詩寫道：「世話我燒知幾回，爲貧爲鈍可憐哉，奈何弱目更成祟，篋棒未除泥棒來。」⁵¹「世話我燒」爲日文「世話を焼く」，意指照料、幫忙處理。「弱目更成祟」源自日文成語「弱り目に祟り目」，意指屋漏偏逢連夜雨、厄運叢生。「篋棒」一詞則是日文「べらぼう」借用漢字表音後而成的借字（当て字），形容程度低、拙劣至極的模樣。「泥棒」則是小偷之意。整首詩用日文讀下來，意爲：過去日本照料朝鮮不知多少回，朝鮮仍窮困驚鈍得可憐，無奈屋漏偏逢連夜雨，尙未改革、脫卻陋習，即引來清兵這幫盜賊。

另一首嘲笑中國報紙之報導荒謬百出的作品則寫道：「自古毛唐噓本場，陳言漢語出何唐。呀然開口唐唐笑，此是唐人唐意張。」⁵² 這首詩韻腳用漢音讀雖押韻，但內容充滿日文特有的諧音與用字。其中「毛唐」乃江戶時期以來對中國的謔稱，充滿歧視意味；「噓」是日文謊言之意，「本場」是日文原產地之意，用來形容道地；「出何唐」訓讀後則是「何から出づ」，意指「自何而出」；「唐唐笑」日文讀爲「カラカラと笑う」，指哈哈大笑；「唐意張」日文讀爲「空威張り（からいばり）」，意指虛張聲勢。整句詩讀完意思如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謊言橫生之地，陳言漢語自何而出，那中國人張嘴哈哈大笑，皆在虛張聲勢。」詩中善用日文「唐」「空」「カラ」「から」等詞的同音之便，透過日文訓讀後語句的重整，巧妙進行意喻上及詞性上轉換。若非熟知日文者，難以理解箇中奧妙。但也正是這種語言本身的隱私性，讓中日間共享的漢字同文性，衍生出彼此異化、斷裂的契機。

岡千仞透過中日文共享漢字形體、卻又存在異音異調的特性，操作文字遊戲，讓傳統漢詩文類跳脫出原本的時空格局，重新融入新的民族情感與在地意識。當中發揮類似戲仿與諷刺的筆觸，運用日文發音特性打造出一語雙關的趣味，企圖在兩國對戰時，展現出不同於漢詩文「本家」中國的風貌，

51 同上註，頁 5。

52 同上註，頁 9。

藉此展現日本的主體性，讓漢詩文此一文類源自於中國漢土的事實，顯得虛無飄渺。同時，透過這些充滿日文趣味的用字遣詞與長期流傳於一般民衆生活圈的傳統童話典故，企圖凝聚日本人的自我認同與愛國意識。

當然，這種擬仿或重構中國古詩詩題、詩作的手法，在日本文學史上原本即具普遍性。平安時期的和歌、江戶時期的俳諧與川柳、幕末維新時期的都都逸，這些韻文多少都可以看到中國唐詩的影子。⁵³ 而狂詩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文類（genre）。自從江戶時期大田南畝充滿諷世精神的狂體漢詩作品掀起流行後，狂詩已然成爲一種與正統漢詩平起平坐的新興文類。從研究者對明治時期漢詩壇的形容即可看出，當時詩壇是硬派（漢文漢詩正統派）與軟派（戲作派狂體漢詩）同時並存、和平共處的情況。⁵⁴ 故此處若單純以狂詩「滑稽諷刺」的文學本質來思考，⁵⁵ 岡千仞《日本詩軍》的諷喻性，可能僅僅是來自於該文類的本質，而非出自對文體的反思。但正是因爲自成一格，才有可能在兩軍交戰的敏感時刻，跳脫「本家」的原生規範，達到與之對抗、彰顯自身主體性的效果，這應該也是千仞計算好的結果。

另一方面，岡千仞《日本詩軍》所追求的諷刺效果，必須在懂得日文音聲與意義的前提下，才可能成立。換言之，《日本詩軍》雖然可以在日本國內擁有廣大讀者、凝聚主體意識、展現日本精神，但同時，這也暗喻了它短期之內無法跨出國界之外的宿命——要踏上殖民地，還是必須回歸傳統漢詩文的創作格律。

四、典律的繼承及其兩難困境

（一）漢詩人的任重道遠

排漢字、漢文的趨勢中，從批判漢文之艱澀難懂、抑或從文章本身格

53 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東京：講談社，1994）。

54 參照木下彪，《明治詩話》（東京：文中堂）；中村光夫，《明治文学史》（東京：筑摩書房，1963）；紅野敏郎、三好行雄、竹盛天雄、平岡敏夫編，《明治の文学》（東京：有斐閣，1972）等。

55 木下彪，《明治詩話》，頁 176。

調來強調漢文體之不可偏廢，乃至於從國族認同的角度對和文體與漢文體進行二擇一，這些不同立場與考量的論爭，左右日本國內漢詩文的發展。明治漢詩人大江敬香（1857-1916）主張漢字為主假名為輔、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時文」論，可謂此波思想鬥爭下的產物。

敬香於 1891 年至 1892 年間不斷強調漢文的特質與重要性。他以為吸收西洋思想有其必要性，但沒必要花力氣去學外國話，因為「外國文字對本國人士而言是不需要的」。⁵⁶ 他熱心建議中央設立翻譯院。對敬香而言，西洋螃蟹般橫行的蟹形文字終究是外國文字。倘若今後將漢學應用於西洋知識的翻譯上，透過「形而上」漢文與「形而下」西洋知識之間的融合，漢文未來的道路會更加寬廣。⁵⁷ 此處所謂的漢文，是站在一種與西洋蟹形文相抗衡的立場被重視，成爲一種注重東洋文化固有性、如意識型態般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又主張時文必須同時具備通俗性與高雅性。他認為，內含的思想與表現的形式是構成美麗文章不可或缺的要素，就算內容如何才氣縱橫、敏銳透徹，若不能用流暢練達的書寫方式表達出來並傳達給讀者明白，則是枉然。他還進一步強調：「腦中不可無泰西思想，手中不可無支那文章。」⁵⁸ 他認為，泰西思想如何「嶄新敏銳」，其文章若是幼稚拙劣，則會讓人「心生厭倦之心」。⁵⁹ 換言之，此處所指涉的「支那文章」（意指廣義的漢字假名交混文），正是完整表達西洋思想不可或缺的工具。原本被強調具有「形而上」意涵的漢文，在這時卻又化身爲乘載西洋思想的工具，形成一種「形而下」的概念重新被發現。

敬香的言論裡，漢文時而具備精神性，時而又是一種機能性的存在，明顯存在一種定義上的錯亂與欠缺原則。前一節曾經提到，漢文的機能性因爲被和文脈取代，是故和文脈雖照舊、甚至加強沿用了漢字漢語，卻已然脫離了受漢文主導的地位，成爲正式代表日本國民的文體。這一連串的角色分化，在敬香的思維中亦可發現。但這一連串脫勾化的運動是一種檯面下的運作，是隱身於「重視漢文漢學」這種曖昧、表面式的漂亮標語之下所進行

56 敬香学人，〈文学界ノ遺利〉，《少年之友》（東京：益友社，1891），2編1號，頁8。

57 敬香学人，〈漢文ノ将来〉，《少年之友》（東京：益友社，1891），2編2號，頁14。

58 敬香学人，〈翻譯院設立ノ議〉，《学海》（東京：益友社，1892），2編6號，頁2。

59 同上註。

的。如此看來，敬香言論中呈現出定義的紊亂，可謂為曝露這種脫勾過程的無意識表現。

雖然對漢文展現出開明的作風，但大江敬香對漢詩則展現一種審慎的態度。甲午戰爭期間這股詩作大量增加的同時，讓人詬病的是大多數的詩作卻品質拙劣，甚至連標榜出自名家之手的詩作也多粗製濫造。⁶⁰ 面對詩作品質參差不齊的現象，敬香評論：「今日從事詩文者既不讀唐詩選講義增進詩意，亦不讀文章規範之講解養成文章能力，（他們）僅僅只是盲目追求流行、憂心跟不上潮流之輩。」⁶¹ 閱讀古詩與文章規範乃詩人的基本功，但不用功的詩人佔了大多數，也難怪放眼望去徒增作家、作品，卻沒有名家。⁶²

漢詩的流行造成品質低下的問題，早在甲午戰爭之前便已出現。敬香 1891 年已公然批評過這種現象。當時許多漢學者著眼漢詩界的未來時便曾發出以下的憂慮，他們擔心目前雖然出現許多創作漢詩的年輕一輩，但清新的詩作少之又少，如此一來漢詩界會跟著就此日趨沒落。面對這種聲音，敬香一改對漢文的開明態度，他以為，漢詩界的發展規模就此停滯倒不啻為好事一樁，因為如此才可以保持漢詩本身的格調。⁶³ 敬香以為，漢詩若像現在這樣繼續發展下去，詩作數量浮濫增加，品質將難以兼顧。唯有縮小到一定程度範圍內，才可以確保詩的品質，維持漢詩本身崇高的文學地位。漢文需重實用性，漢詩則重藝術精神性，敬香無意識中感受到漢文「機能性」的同時，在追求漢學固有精神面上，卻又轉向到漢詩本身。注意到漢詩品質低落的他，深切感受到保護漢詩崇高地位的迫切使命感。

這種錯綜的性格，影響他面對臺灣殖民地漢詩活動的態度。1898 年 12 月，漢詩人笏山衣洲在《臺灣日日新報》的社長守屋善兵衛邀請下，接替在臺灣因病猝死的阪部春燈，來臺擔任漢文部的主任。衣洲來臺後，陸續在敬香於日本國內主持的漢詩文雜誌《花香月影》上刊登作品，短期回東京期間也出席敬香主持的詩社活動「花月會」，與敬香保持著相當親近友好的關係。敬香在笏山衣洲來臺前，曾經高度評價其決心來臺之舉，並不忘提醒衣洲：

60 波軒主人，〈明治二十七年の文学〉，《精美》（東京：益友社，1895），41 號，頁 36。

61 敬香学人，〈真正ノ詩文家〉，《精美》（東京：益友社，1893），4 號，頁 2。

62 敬香逸人，〈詩学問答録〉，《精美》（東京：益友社，1895），41 號，頁 38。

63 敬香学人，〈漢詩ノ将来〉，《少年之友》（東京：益友社，1891），2 編 2 號，頁 11。

「人在異鄉宜自愛少聲色，君任重道遠，尙請多四處觀察走動。」⁶⁴ 在當時國家主義高漲的年代裡，這句「任重道遠」的忠告，看得出敬香爲求國家發展而視開拓臺灣爲重要任務的苦心。

1899 年 7 月，衣洲短暫回到東京，參加「花月會」主辦的歡迎會。衣洲意氣風發的模樣在友人間口耳相傳，大家皆爲衣洲的飛黃騰達感到振奮與欣慰。⁶⁵ 田邊蓮舟也是其中之一，當他得知衣洲得到兒玉的知遇之恩、甚至住在兒玉的別墅南菜園時，他在信裡鼓勵衣洲：「冀北如聞逢伯樂，不妨昂首一長鳴。」⁶⁶ 且在往後的 1900 到 1901 年間與衣洲的書信往來中，蓮舟認爲當時日本文壇上龜谷省軒、依田學海等文章大家皆垂垂老矣，憂心詩文壇後繼無人，而衣洲此番來到「漢人視爲化外，文人騷客記之詠之無幾」的臺灣，恰恰可以在此完成不朽的文章大業、開拓新天地。⁶⁷ 當衣洲與蓮舟的通信刊登在《花香月影》上，敬香作爲點評人在文章旁註解如下：「(蓮舟) 提醒極懇勤。衣洲之任亦重矣。」⁶⁸ 無論是蓮舟的殷殷告誡、或是敬香的再三提點，在在說明他們對衣洲「任重道遠」的認知。這個「任」與其說是對國家的責任，倒不如說是一種對文章的責任。正所謂「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唯有透過文章，才能貫徹、實現他們對兩者的使命感。這個例子不是偶然。早在 1896 年土居通豫隨水野遵來臺擔任民政局通信局長前，漢詩人高島崇(箆川)給土居的送行詩即提到：「詩境年來恨不寬，天涯載筆向臺灣，此行不負平生志，欲以斯文化百蠻。」⁶⁹

站在國家統治者的角度而言，明治政府動員國內的漢詩人來臺或許有其

64 敬香逸人，〈送靑山衣洲君之臺灣序〉，《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8)，21 號，頁 16。

65 相對於蓮舟等人對衣洲在臺活動的期盼，他的好友西村天囚(1865-1924)則告誡他：「祇願游子與春婦、南国于今瘴氣飛」、「鶯花不若京華好、勿滯南中着葛衣」，勸他不要一直棲身於臺灣，應當儘早衣錦歸鄉、回到中央。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南菜園の詩人靑山衣洲(上)〉，《臺大文學》5.4(1940): 299。西村天囚與其他人對衣洲的忠告顯得如此南轅北轍，實與天囚本身實際的中國經驗、以及「文章報國」之志懸而未決的焦躁感有關。

66 同上註。

67 蓮舟仙客，〈復靑山衣洲書〉，《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901)，66 號，頁 4。

68 同上註，頁 3。

69 高島箆川，〈送土居香國赴任臺灣〉，《日清戰爭實記》第 44 編，頁 51。

政治收編、懷柔臺人的想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些自日本內地千里迢迢來到叢爾小島臺灣的漢詩人們而言，他們所背負的「大任」，不只是對國家的使命感，也保留了發揚漢學的基本責任。特別是初山衣洲這種並非以官員或總督府職員身分、而是以在野的記者與漢詩人身分來臺者，他們身上所背負的，是來自國內同志們要他們在臺灣這個「化外」之地盡心盡力於漢詩文復興運動的龐大期待。帶著宣傳皇國光榮國威任務來臺的日本漢詩人們，或許足以稱爲「帝國主義的協力者」，但在「任重道遠」這句話當中，卻可以清楚發現這句話不僅僅是對國家的使命，其中還混雜了主張文章不朽的漢學文化意識。

然而，從本文最後的分析可以發現，當國語與國體的一致在明治日本國家主義榮光下成爲一種普世價值之際，他們對漢詩文的執著，亦必然曝露出與國體間的齟齬。

(二) 格律·和臭·殖民地：統治者的兩難

明六社的啓蒙思想家西村茂樹曾經在〈文章論〉一文中，提到受限於中日文語順與表達方式的差異，日本人創作漢詩文時，無論再怎麼想要追趕上母語話者，終究不可能去除掉和臭的氣息，故詩中處處可見和風式的表現乃理所當然。⁷⁰ 神田喜一郎則定義「和臭」爲「日語語言性格所造成構文上的缺陷、或是因漢字訓讀所造成的漢字的誤用等，日本漢詩文之中的日本式特徵。」⁷¹ 正因爲無法克服的環境因素，自然衍生出民族本位角度的創作方式，例如平安朝的菅原道真或江戶時期的賴山陽運用漢文時，不甘僅止於模仿中國，反而逆向操作似地故意藉由充滿和臭式的語句來書寫與創作。⁷²

70 西村茂樹，〈文章論〉，收入日本弘道會編，《西村茂樹全集》（京都：思文閣，1976），第2卷，頁114-122；原載於《東京學士會院雜誌》6編4冊（1884）。

71 神田喜一郎，〈和習談義〉，《文學》34.7(1966.7): 82。

72 川口久雄指出菅原道真的漢詩毫不避諱地故意混雜入具有和臭般的用字遣詞，這是因爲道真透過日語訓讀式的朗讀法來享受漢詩創作的樂趣，而這種不自覺的意識使得作漢詩時需要嚴守固定聲律與對句的自律性出現鬆動的情況。另外，佐久節提到德川時代漢文學的發展時，認爲賴山陽作文章的態度是一種不單純滿足於模仿中國，而是具有創作「屬於日本人的漢文」的意圖。「換言之，就是努力將漢文日本化，也因此，山陽的文章中常會看到一種故意呈現出和臭式的字句。」（頁828）參考川口久雄，《平安朝の漢文學》（東

然而另一方面，翻開江戶時代以來的詩論習作，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仍多以中國傳統詩作來作為判斷優劣的標準，對和臭的批判絲毫未減。中村幸彥曾指出，江戶時代至幕末的日本文人不斷強烈意識到，用字遣詞是否有錯是影響漢詩表現道地與否的重要指標。⁷³ 例如，江戶中期名詩人江村北海的《日本詩史》（1771）將江戶初期漢詩壇發展評為「渾沌期」，認為受制於幕府鎖國政策，此時與中國文化的交流大減，不若平安時期年年都有中國船隻頻繁往來中日之間，長期下來日本人對漢籍或漢詩文的語言能力也大幅衰退、對詩的聲律敏感度下降，故後人看來，此時的詩不論在形式或規則上，都顯得錯誤百出、內容不成熟。⁷⁴ 換言之，從江戶時期以來，比起詩意，詩作本身格律正確與否，才是評價詩文發展高低的重要基準。

這種對格律韻字平仄的自戒，連帶使得江戶漢詩人對中國韻書漢字分類的準確性產生懷疑。津阪孝綽《夜航詩話》（1825）指出清代敕撰典籍《佩文韻府》未能嚴格區分韻字平仄，這點對中國詩人或許不成問題，但日本詩人使用上則需要特別留心。日尾約《詩格刊誤》（1850）認為六朝韻書將音韻分為 206 韻，但這些韻字大多一字多音，故歸於一韻不甚恰當。⁷⁵

對詩作格律的批判意識延續到明治中期依然可見。例如永井荷風之師岩溪裳川曾對當前漢詩充斥和臭與俗臭一事提出批評：「近日在益友社的介紹下，我讀了不少初學者的詩，但往往一拿到這些稿件便覺得異臭撲鼻，讀了才發現滿紙迂腐陳言，讓人幾乎要吐出滿肚子胃酸。這種異臭有兩種，一種是俗臭，一種是和臭」；⁷⁶ 在他看來，這些作品是價值低到連「一圈半點」都拿不到。⁷⁷ 他旋即指出，和臭的發生來自於過去以來漢詩教育之弊，因為「教詩者也多以淺顯易懂為優先，大多先教日人作家的詩作，傳誦朗讀、浸淫

京：吉川弘文館，1981），頁 87-88；佐久節，〈德川時代の漢文学（其一——德川時代漢学者の文章）〉，《近世日本の儒学：徳川公継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東京：岩波書店，1939），頁 815-830。

73 中村幸彥，〈近世漢詩の諸問題〉，《近世の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6），頁 1-32。

74 同上註，頁 11。

75 此處轉引自譚雯，《日本詩話的中國情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74-75。

76 岩溪裳川，〈硯凹余滴（第九）〉，《精美》（東京：益友社，1896），2 編 1 號，頁 23。

77 同上註。

其中後，導致其臭深入肺腑，終釀成這種無可救藥的毛病。」⁷⁸ 原本日本人對和臭的敏感度不高，直到荻生徂徠（1666-1728）公開將和臭視為引以為戒的大問題，和臭才成為漢詩人們創作詩文時必須自我警惕、犯之不得的大忌。⁷⁹ 岩溪裳川對和臭的嫌惡，可謂赤裸裸地展現這種自戒的現象。這種對和臭自戒與否的態度本身，反映出一種思考：由於透過精神論的意識型態立場來看待漢詩文，岩溪裳川不得不開始考慮「和臭」此一要素的介入，是否會招來漢詩文本質上出現崩解的危險。

同樣的心情可見以下。初山衣洲來臺後，將臺北的生活點滴寫入詩中，這一連串臺北生活誌般的作品幾乎同一時間刊載在《花香月影》與《臺灣日日新報》上。當中，寄稿《花香月影》49號的六篇詩作描寫的是在臺北南菜園生活的日常景象。大江敬香對這些作品讚譽有佳，讚南島風光宛如重現於衣洲筆下，「真個漢客口吻」。⁸⁰ 三個月後，以南菜園日常生活風景為主題的詩作再次登場，詩中不時穿插臺灣特有風景的相關描寫與字詞，敬香對此讚譽：「臺北風景宛在眼。以雋永瀟灑勝。是衣洲擅場。說到絕句毫無邦人習氣。吾豈得不推賞乎。」⁸¹ 這種稱讚不只出現在描寫臺灣風景的作品，甚至不是在地風景為主題的詩作，敬香亦讚：「頗有漢客口吻，移居氣者非也。」⁸²

這種稱讚或許多少帶有客套的成分，但這種半公式化的溢美之詞背後，極可能流露一種平板印象：敬香盛讚衣洲詩中「毫無邦人習氣」的同時，無意識表達出一種對漢詩典律的崇敬與「和臭」的戒心。換言之，對敬香而言，詩作之優劣與否，與其是否接近中國詩作似乎具有絕對的關連性。這種「漢土為宗」的現象在當時漢詩界相當普遍。例如田邊蓮舟的〈題謔

78 同上註。

79 荻生徂徠堅持創作中國式漢詩文，嚴格地自我警戒「因和文訓讀影響而搞錯字義」的和字、「有違位置上下排列之則」的和句、「不純於語氣聲勢之中華表現」的和臭等表現。

80 大江敬香，〈衣洲逸士^{初山} 南菜園在臺北城外古亭莊己亥八月為風雨所倒頃再築告成乃借其一廡安排筆硯朝暮吟眺獲小詩六首雖拙亦紀實也〉，《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900），49號，頁9。原文「南島風光。歷歷在眼。第三第五。真個漢客口吻。」

81 大江敬香，〈衣洲逸士^{初山} 南菜園雜咏^{園在臺北南}〉，《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901），53號，頁9。

82 大江敬香，〈衣洲逸士^{初山} 疊韻寄人二首〉，《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9），36號，頁8。

試餘撰後》一文，曾讓依田學海對其內容風韻大為讚賞，並特別附帶評道：「字法章法。絕是漢人手段。吾邦才子。決不做得。」⁸³ 大江敬香亦云：「蓮翁詩文。頗有漢客筆致。蓋得力於燕京駐劄之日者非耶。」⁸⁴ 翻開《花香月影》，附在詩作之後的編者點評，多見「太似魏晉人口角」、⁸⁵「有唐初之音」、⁸⁶「極肖南宋人」、⁸⁷「清人口吻」⁸⁸等評價。另外，拿來比擬的對象，則不脫歐陽修、韓愈、白樂天等文章大家，甚至是高啓、吳麟徵、陳維崧、王士禎、袁祖志等明清詩人詞人也曾名列其中。與此相較，除成島柳北外，不曾見日本詩人的名字入列。換言之，以中國古典為「典律」(canon)的漢詩文意識自古以來即存在，甚至到了明治時期「蔑視中國」之風盛行之際，漢詩的典律仍以中國古典為中心，並未動搖。⁸⁹

對用字遣詞再三斟酌的情況，特別容易展現在創作正統漢詩的場合。《日清戰爭實記》中有一則詩借用玉門關外新疆白龍堆的大漠風光，作為兩軍交戰的地理背景，卻被點評人本田種竹當眾質疑是否合宜。⁹⁰ 這種公然質疑他

83 田邊蓮舟，〈題譚試餘撰後〉，《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9)，34號，頁3。

84 同上註。

85 《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9)，43號，頁8。

86 《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900)，51號，頁17。

87 《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8)，22號，頁9。

88 《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8)，7號，頁9。

89 初山衣洲在臺期間閱讀的書籍書目，或許也可用來理解衣洲知識體系的構成。衣洲於1900年1月至1902年10月寫下的〈澄心廬日記〉(未刊稿，原件收錄於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古籍典藏室)顯示，在臺期間他所購買、接觸的書籍以中國古籍為主。例如直接向書店訂購者有：1901年2月13日「赴艋舺書肆購買《康熙字典》、《二十二史》」(原文日文，中文為筆者自譯，以下同)；1901年4月23日「大阪嵩山堂送來《世說(新語)》、《莊子》、《博物誌》」；1901年7月14日「大阪嵩山堂送來《壯悔堂文集》」；1901年12月4日「大阪嵩山堂送來《明詩綜》、《毛詩鄭箋》」；1902年3月4日「向大阪嵩山堂訂購《遜志齋全集》、《徐孝穆全集》」等，向日本內地購買的書籍為大宗。另外，還有部分是與日、臺友人交換所得者，例如：1900年6月8日「橫澤(次郎)送來《山海經》與唐代叢書」；1901年3月30日「向市村藏雪買《宋學士全集》」；1901年6月18日「佐藤送來《歸震川全集》、《方望溪全集》、《吳梅村詩集箋注》」；1900年8月19日「新竹鄭鵬雲來，贈《廈門志》」；1900年10月18日「返還後藤(新平)長官差使《醉古堂劍掃》」；1902年2月12日「關口長之來，贈我《黃詩全集》」。這期間除了偶爾自日本收到內地出版的詩文集外，閱讀的書目全為中國古籍。

90 福原周峰，〈外征雜記二十首〉，《日清戰爭實記》第16編，頁58。

人詩作的用字遣詞、並印刷成鉛字的例子，在陶冶性情、重視交流的漢詩壇上不太常見。另外，1899年12月底，衣洲陸續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兩首詩作與詩評。其中一首為「歲晏天涯得穩栖。石池莎徑望萋萋。顏唐每被鹽車困。躋陟重歎驛路低。」⁹¹另外對臺人詩人的評語為「窗外放眼眾山低。似此意興。宜求是雌黃之外。」⁹²然而，隔日馬上出現訂正啟事：「訂誤前號衣洲詩。顏唐當作飄零。又評語雌黃。當作驪黃。」⁹³此處的「顏唐」意指「衰敗」，衣洲則訂正為具有「凋零」意涵的「飄零」一詞。另外「雌黃」一詞則是十分明顯的誤用，原意為古代用來修改錯字的液體或修改文章的動作。更改後的「驪黃」，語源來自「牝牡驪黃」，意指「事物的表面」。訂正過後的語意，成為衣洲所意圖表現的意義：「眼前的風景不過是表面的事物，真正的意境則要跳脫於表面之外。」

誠如島田謹二所言：「若想融入臺人讀書階級之間，並透過詩書之誼深入他們內心、進而同化他們，必定要找個能讓本島人推崇心服的詩人才有辦法。」⁹⁴此處的「推崇心服」，正是意味渡臺的日本漢詩人們需要以完美的文章展現統治者的權威。但同時，他們也必須不時地思索著「正確的」、「最符合中文的」語意表現與字詞運用，必要時還要作出最適切的修正。換言之，足以稱為完美的文章，非得要以中國語為規範的文體與漢字表現為基準才得以成立。這種因中國古典典律意識而衍生出對和臭的自我警戒，以及始終無法與其完成切割之漢詩人們的矛盾心情，若是擺在強調日本國威光環的時代脈絡下檢視，宛如是個時代錯誤的風景。

然而，這種對規範性（典律）的自我意識本身實具有兩種面向，一種是政經面——身為統治者的權威證明，一種則是審美面——透過排除和臭來達到漢詩性的完整。審美性的判斷往往無法消融於政經面的考量，不受政經面

91 初山衣洲，〈獨坐無聊。賦此遣悶。四疊前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12.22，1版。另，詩中部分勘誤感謝中興大學廖振富教授與匿名審查人不吝賜教，特此致謝。

92 初山逸，〈評 粘舜音 南菜園訪衣洲先生敬和■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12.23，1版。原文：「一味率真。絕不假彫琢。所謂詩中有人者是也。窗外放眼眾山低。似此意興。宜求是雌黃之外。己亥冬至節 初山逸妄批。」另，■為原文難以辨識之處。

93 初山衣洲，〈喜齋藤鶴汀見訪。次其詩韻〉，《臺灣日日新報》1899.12.24，1版。

94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南菜園の詩人初山衣洲（中）〉，《臺大文學》5.6(1941): 381。

控制。這種雙重性的特徵，複雜化了日本漢詩文人的規範意識與重振漢詩文的動機。

五、結 語

東洋共通的漢學雖是來自中國的產物，但甲午戰爭中國敗戰的事實與「日本不可沒有漢學」的交錯認識下，漢學界出現將「源自中國的漢學」重新定位成「由日本再興的漢學」之傾向。明治的漢學者們透過甲午戰爭，進一步將漢學日本化，從中發現日本的主體性。

隨著中國學脫離漢學獨立、興盛，漢文教育則從國語教育的範疇被切割出來，呈現出衰退的傾向。這種現象亦反應在文體變化上。甲午戰爭前後，面對國內蔑視中國的意識不斷升高，排漢字、排漢學的聲音四面八方響起，日本有心知識分子仍無畏地站出來大聲疾呼，不斷地強調漢學之於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企圖要在政治的變化當中重新確立漢學的新位置。他們鼓吹漢學的重要性、提倡使用漢字成語、加強東洋倫理思想教育。然而，此處所謂漢字成語的常用，已然脫離了傳統漢學（包含漢文）的思想文脈，易於被還原成語言表現的工具。身為倫理教育工具之一的漢語漢文，雖然看似比以往更深入國民教育，但實際上漢文體所代表的語言價值已經被「我文脈」的日本式文脈完全代替。

文體一方面與國體完成外部的合體，另一方面，其內部亦出現自我分裂的現象。這一點可以從兩個層面討論，其一是甲午戰爭時期大量漢詩作品的創作呈現。這個時期日本詩人一方面巧妙運用正統邊塞詩的用典與轉喻，來凸顯中國的異族統治與日本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則如岡千仞的狂詩，透過中日文共享漢字形體、卻又存在異音異調的特性，重新融入新的民族情感與在地意識。這種狂詩雖達到文體上「形」的延續，但又因「聲音」的異化而跳脫傳統漢詩結構上的束縛，重新完成自我同一性。

其二，文體與國體的交融與分化出現在殖民地，則呈現出另一片與眾不同的風景。例如活躍於明治詩壇的漢詩人大江敬香與田邊蓮舟送給前往臺灣的崑山衣洲的「任重道遠」這句話，其中除了潛藏因反中意識而得以具象化的日本國家意識，還內含以日本為中心、企圖重振亞洲的漢學意識。透過

「任重道遠」這句話的雙重性，明治漢詩人們的複雜心理，恰恰反映出文體（漢文脈 / 和文脈）與國體（屬於中華文化圈的日本 / 身為東洋中心的日本）之間交錯、複雜的歷史。

然同一時間，日本漢詩人來到殖民地雖身負宣傳日本國威的任務，創作漢詩時卻嚴格地爲了保持漢詩之正統性而時時自我警戒著。他們一方面爲了文明化臺灣人、使臺灣人對日本產生敬畏之意而躊躇滿志地踏上臺灣這片土地，但受限於臺灣缺乏與日本同樣的「聲音」土壤，他們亦不得不自我矛盾地受限於漢詩文此一文類的傳統規範性——接近「典律（canon）」（中國古典）才足以被評價爲優秀的作品。「規範」意識無法完全消融於宣傳國威的政經意識型態之中，此一現象的存在，反而讓重振漢詩文的作爲，變得益加複雜。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少年之友》，東京：益友社，1890-1892。

《学海》，東京：益友社，1892。

《精美》，東京：益友社，1893-1895；1896-1897。

島田薰編，《日清戰爭實記》，東京：博文館，1894-1896。

烏玉山人（岡鹿門），《日本詩軍》，東京：新進堂，1895。

小中村義象編，《梧陰存稿》，東京：六合館，1895。

《花香月影》，東京：花月社，1898-1901。

林鷺峰編，《華夷變態》，東京：東洋文庫，1958。

初山衣洲，〈澄心廬日記〉（未刊稿），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古籍典藏室，1900-1902。

帝國文學會編，《帝国文学》1-26，1895-1920，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80。

《臺灣日日新報》1898-1944（電子資源），臺北：漢珍數位圖書公司，2005。

岡千仞著，張明杰整理，《觀光紀游 觀光續紀 觀光游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

二、近人論著

子安宣邦 2003 《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

- 小島毅 2006 《近代日本の陽明学》，東京：講談社。
- 山本正秀 1965 《近代文体発生の史的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 川口久雄 1981 《平安朝の漢文学》，東京：吉川弘文館。
- 中村光夫 1963 《明治文学史》，東京：筑摩書房。
- 中村幸彦編 1986 《近世の漢詩》，東京：汲古書院。
- 中村春作等編 2008 《「訓読」論——東アジア漢文世界と日本語》，東京：勉誠出版社。
- 木下彪 1943 《明治詩話》，東京：文中堂。
- 合山林太郎 2007 〈野口寧斎の後半生——明治時期漢詩人の詩業と交友圏〉，《斯文》115(2007.3): 1-16。
- 吉川幸次郎 1944 《支那人の古典とその生活》，東京：岩波書店。
- 吉川幸次郎 1962 《漢文の話》，東京：筑摩書房。
- 吉川幸次郎 1967 《中國詩史》，東京：筑摩書房。
- 西村茂樹 1976 〈文章論〉，收入日本弘道會編，《西村茂樹全集》第 2 卷，京都：思文閣，頁 114-122；原載於《東京学士会院雜誌》6 編 4 冊（1884）。
- 色川大吉 1970 《明治の文化》，東京：岩波書店。
- 佐久節 1939 〈徳川時代の漢文学（其一——徳川時代漢学者の文章）〉，《近世日本の儒学：徳川公継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東京：岩波書店，頁 815-830。
- 村上哲見 1994 《漢詩と日本人》，東京：講談社。
- 東海大學中文系編 2003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
- 前田愛 1989 《前田愛著作集 1 幕末・維新期の文学：成島柳北》，東京：筑摩書房。
- 紅野敏郎、三好行雄、竹盛天雄、平岡敏夫編 1972 《明治の文学》，東京：有斐閣。
- 倉石武四郎 1981 《倉石武四郎著作集》第 1 卷，東京：くろしお出版社。
- 神田喜一郎 1966 〈和習談義〉，《文学》34.7(1966.7): 81-87。
-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 1940 〈南菜園の詩人笏山衣洲（上）〉，《臺大文學》5.4: 237-299。
- 神田喜一郎、島田謹二 1941 〈南菜園の詩人笏山衣洲（中）〉，《臺大文學》5.6: 375-462。
- 神田喜一郎編 1983 《明治文學全集 62 明治漢詩文集》，東京：筑摩書房。
- 陳培豐 2006 〈日治時期的漢詩文、國民性與皇民文學——在流通與切斷過程中走向純正歸一〉，《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籌備處，頁 457-498。

陳瑋芬 2005 《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森岡緣 2008 《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東京：勉誠出版社。

黃美娥 2006 〈日、臺間的漢文關係：殖民地時期臺灣古典詩歌知識論的重構與衍異〉，《臺灣文學研究集刊》2(2006.11): 1-32。

黃美娥 2006 〈跨界傳播、同文交混、民族想像：賴山陽在臺灣的接受史(1895-1945)〉，「臺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2012 〈在「同」與「不同」之間：玉山吟社的詩歌空間意義與社群文化生產〉，「帝國在臺灣工作坊」會議論文，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6.15。

楊永彬 2000 〈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出版，頁 105-181。

橋本恭子 2012 《『華麗島文学志』とその時代：比較文学者島田謹二の臺灣体験》，東京：三元社。

齋藤文俊 2011 《漢文訓讀と近代日本語の形成》，東京：勉誠出版社。

齋藤希史 2007 〈「支那学」の位置〉，《日本思想史学》39(2007.9): 3-10。

齋藤希史 2007 《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

齋藤希史 2009 〈〈同文〉のポリティクス〉，《文学》10.6(2009.11): 38-48。

藍弘岳 2011 〈「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の國家想像與十九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22.3(2011.9): 71-112。

譚 雯 2007 《日本詩話的中國情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カッシーラー (Ernst Cassirer) 著，山本義隆譯 1979 《実体概念と関数概念：認識批判の基本的諸問題の研究》，東京：みすず書房。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Poetry and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Meiji-Period Japan

Hsu Shih-chi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flicts of ideology that influenced Japanese poet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During the war, at the height of Japanese colonialism, Japanese literature underwent a process of enforced 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cy. Though there were calls for the banning of *kanji-kanbu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Japanese sinologists objected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traditional ethics, morality and history. Although Chinese characters survived Meiji nationalism, they were no longer used in their original linguistic context due to the adoption of colloquial-style writing. Eventually, this phenomenon caused a conflict for Japanese poets between their Chinese poetic consciousness and Japanese imperial ideology. They went to Taiwan with a mission to both demonstrate Japan's superiority as a colonial ruler and revive Chinese literacy. However, in their attempts to prove that they had a high degree of Chinese literacy by composing Chinese poetry that showed their flawles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 its original linguistic context, they could not help incorporating allusions to the canon of Chinese poetry, a practice which was in conflict with the ideology of Meiji nationalism.

Keywords: Chinese poetry, Meiji Japan, *genbun'itchi* (colloquial-style writ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ashu* (Chinese poems in a Japanese style)

* Hsu Shih-chia is a lecturer in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 at Yamagata University, Japan.